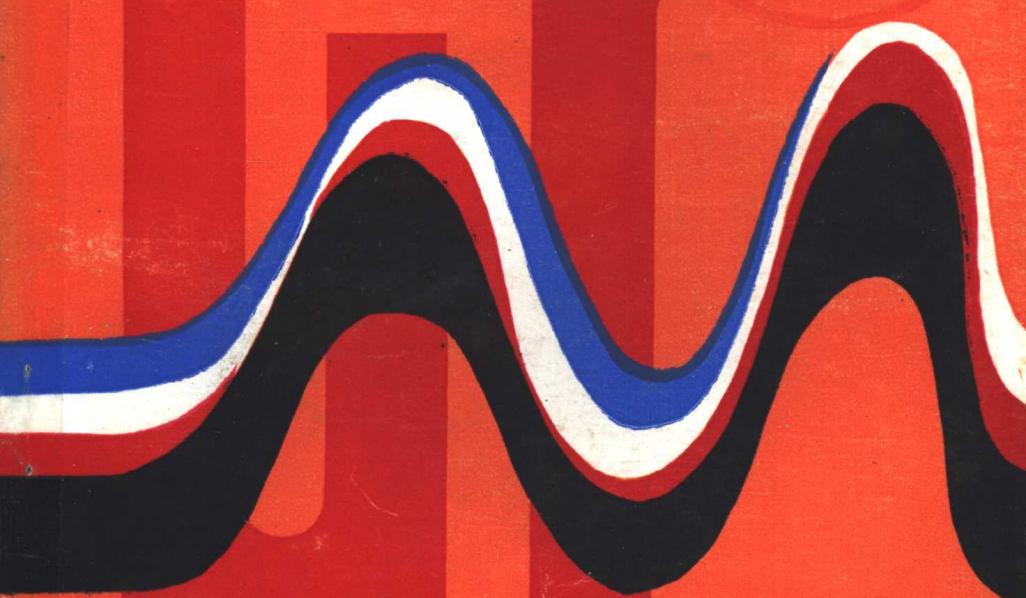


17.13

夷陵风云

——革命回忆录



中共宜昌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夷陵风云

—革命回忆录

中共宜昌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十月

主 编：蔡 大 泽
责任编辑：郑 学 武
封面设计：谢 宣 周
校 对：黄 玉 培
刘 玉 蓉

夷 陵 风 云
内 部 发 行

*

编辑：中共宜昌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印刷：长阳县新华印刷厂

印期：一九八八年十月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2 130千字

5.65印张 印数：1—1700册

准印证：宜县内印字（88）009号

定价：1.80元

编 者 的 话

宜昌古称夷陵，素以川鄂咽喉著称，在鄂西党的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许多重要会议，曾在宜昌召开；党领导开展了许多重大革命活动，并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曾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夷陵风云》辑录了革命老前辈对党在宜昌领导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斗争的史实。这些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见证，是对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生动教材，也是了解历史、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这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促进“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夷陵风云》这本革命回忆录，按四个历史时期史实发生的时间顺序，辑录了四十篇文稿。这些文稿中，有老同志亲笔写的回忆录；有本办走访整理的口碑材料；有的是根据老同志撰写的有关材料节录的；也有的是转载的。在编辑过程中，本办将上述史料与有关历史文献进行了认真核实，个别文稿作了补充修改。本书报请宜昌地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陈兆尧同志审阅，后经编辑郑学武、韩国元同志对史实作了进一步考证，最后由本办主任、副编审蔡大泽同志修改定稿。

由于编者业务水平有限，加之掌握的文献资料不尽完整，很可能出现某些缺点甚至错误，殷切希望革命老前辈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改进编写工作。

编 著

一九八八年十月

當時，我還在讀書，就聽說過這兩個人物的傳奇故事。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他們都是窮人，但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並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也對自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卷之三

目 录

编者的话

- | | | |
|-----------------|-------|--------|
| 大革命时期宜昌革命活动回忆 | 易朴 | (1) |
| 北伐时期宜昌的建党及其革命活动 | 佟文正 | (11) |
| 峥嵘岁月的回顾 | 胡楚藩 | (16) |
| 北伐军克复宜昌 | 张任夫 | (19) |
| 吴玉章在宜昌 | 孙壘东 | (24) |
| 大革命时期宜昌地下党的活动 | 王均予 | (29) |
| 土地革命时期共青团宜昌县委 | 魏文伯 | (32) |
| 乐天溪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 | 杨学清 | (34) |
| 西乡革命活动回忆 | 覃元发 | (40) |
| “三师”学生的两次反帝斗争 | 鲁觉民 | (48) |
| 我在三师的工作点滴 | 洗百言 | (50) |
| 鸦鹊岭一带党组织建立概况 | 郭池夔口述 | (52) |
| 忆革命征途中的二三事 | 吴远孝 | (54) |
| 我在宜昌道委担任交通员简况 | 李凤林 | (58) |
| 峡江公学党小组 | 单椿荣 | (60) |
| 我所知道的峡江学校 | 高振东 | (62) |
| 中共宜昌特支建立经过 | 李声簧 | (65) |
| 我所知道的中共宜昌区委 | 韦君宜 | (67) |
| 我在宜昌工作片断回忆 | 张清华 | (70) |
| 宜昌中心县委及其工作范围 | 王致中 | (76) |

- 抗战初期的中共宜昌县委 高山 (79)
抗战时期宜昌的青年学生运动 张泽生口述 (81)
我对抗日时期鄂西地下党的回忆 李世荪 (86)
我在鄂西工作的回顾 许云 (93)
抗战时期的中共黄柏区委 王耀先 (97)
从恩高到石碑 夏牧原 (99)
宜昌抗战剧团 钟纪明 (104)
周恩来和益州剧场 郑学武整理 (111)
川小宣传队始末 周方琳 (114)
宜昌战地文化服务总处 刘明凡 (122)
树人补习学校 刘生鉴 (125)
宜昌四川中学工作的回忆 林迪生 (127)
宜昌音乐界抗敌联合会 瞿维 (131)
我对宜昌革命活动的追忆 简化生 (133)
回忆宜昌革命往事 张一之 (152)
乐天溪中心小学的抗日救亡活动 黎祥清 (160)
宜昌杨柳树巷联络站 周健 毛云峰 (163)
解放前夕的中共宜昌县委 张天民 张广元口述 (167)
解放时期的南保兴宜县黄柏区 霍英 王云峰口述 (169)
龙泉乡公所投诚之经过 王忠福 易友三口述 (176)

大革命时期宜昌革命活动回忆

易朴

(一)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宜昌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三师”）。一九二五年秋，从武昌派来了两名教员到“三师”，一个叫祖山竹，他不多出面，据说是共产党员；另一个叫洗百言，他是国民党员，是奉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命令来宜昌秘密筹建宜昌市党部的。祖、洗以“三师”、十二中两校学生为基础，秘密发展国共两党的党员。到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在夷陵中学等学校的师生中，及社会青年中也发展了部分国民党员。

我第一次接触政治活动是在一九二六年。那时，我叫易吉光，做小买卖，家对面住的王均予是夷陵中学的学生，我们是好朋友。这年春上，王家去“上坟”（扫墓），他就约我和他的堂兄王明琴同去上坟。王明琴住在乡下，也是夷陵中学的学生。在路上，王明琴问我最近看的什么书，我说：“看《七侠五义》、《包公传》啊！”他说：“你看不看‘三民主义’？要看，我给你带一本来。”不几天，他果然给我带来一本，并嘱咐：“你不要对外人说是谁借的。”一个晚上我就看完了。后来他又给我借来《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看后，我觉得比过去看的那些书有味道，于是，

我就向王明琴打听：有“三民主义”，还有什么组织没有？他们是些什么人？你能不能介绍我参加？他说：“有呀！有些人我认识，不过，介绍你参加是要经他们同意的。”大约过了半个月，他又给我带来一本书，书名叫《向导》。他说：“你好好看看这本书，它比‘三民主义’还有味道些。”我只读了两年书，书中有许多政治术语不懂，就请他讲解。我通过读这些书受到了启发，经“三师”学生黄大桢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组织，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

(二)

一九二六年暑假，“三师”的学生回乡度假去了。县城里国民党组织工作，就交给我和王均予负责，并要我们继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我家开杂货铺，利用业务之便结识了不少人，在与许多人的交往中，时而谈及政治问题、组织发展工作。一九二六年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寄给宜昌两百份入党表，准备在一些机关和单位发展党员。寄件写的“王易”收（即王均予、易吉光），稽查处在检查邮件时发现了，就到处查“王易”这个人；一个星期没查出下落，就把九字学校校长的儿子王雄弄去讯问了两次；王雄说“‘王易’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姓名，是两个人的姓。”稽查处根据王雄的分析，怀疑到王均予和我的头上。在邮局的国民党地下党员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把情况告诉我，我父亲说：“你把这个买卖收起来跑了吧！”前几天，稽查处的周老五来问过，后来他又向老太太打听过“王易”这事，这是危险信号。”这样，我同王均予一道跑到宜都县安福寺亲戚家里，隐蔽了两个月。

十一月份，我打听到北伐军攻克武汉的消息，与王均予

商定，连夜出发去武汉。我们去武汉找到了省党部组织部长陈卫东，讲了上述情况。陈说：“你们现在回去是危险的，暂时留在这里，省里要开代表大会，你们作为宜昌的代表参加会议。”

不久，国民党党务干部学校招生，我和王均予都被录取了。入学后，学校负责人董必武找我们去谈话。接着学“三民主义”。要我们知道谁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谁是朋友。这时我才晓得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是三座大山。一次，董必武见我身着学校纠察队发的蓝布衣服，问：“你当过兵吗？”我答：“没有。”他接着说：“你穿这衣服要谨慎点，这是革命衣服啊！”我意识到自己与一般老百姓不同了。这年十二月，经黄大桢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

一九三七年三月底，党务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结业。学校举行结业典礼，学校负责人讲话后，我代表学生致了答词。结业后，党派我任中共宜昌县委书记（应称特支书记——编者）。这时，中共党的组织仍处于半公开状态，因此，我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宜昌县党部筹备主任。我到宜昌时，县党部正在筹备中，中共党的特支原负责人叫胡楚藩、干事叫胡运良。

在我到宜昌之前，国民党宜昌市党部就建立了，挂出了牌子。市党部的主要负责人，是以共产党员黄大桢、佟文正等人（他们都是跨党人士）为主，也有国民党员参加。总工会、农协、妇协、商协、青年、教育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见了我高兴地说：“老早就盼你回来，现在忙不开呀！”大家谈了些宜昌的情况及组织机构何

题。我说：“应该先成立县党部。”佟文正说：“市党部已经成立了，怎么办？”我说：“成立了就成立了嘛，县党部下面是市党部。”

(四)

刚回到宜昌，有人告诉我，“宜昌的土豪劣绅对市党部的人拉得很紧，他们见市党部的人缺什么就送什么。黄大桢这个人很精明，不同他们（指土豪劣绅）搞在一块。”约过了半个月，我租用的房子被人收回，只得搬到姐姐家里住。一天，商会的段少芳和夷陵中学的陈松文来了。一见面，他们就是“恭喜！恭喜！”那一套，接着便说：“韩二爹知道易先生回来了，他因脚痛没亲自来拜访，韩二爹听说易先生没房子住，要我们来转告你：××路有一栋房子，他都布置好了，请易先生搬去住。”我问：“韩二爹是不是县商会会长韩慎之？”来人说：“是的。”我说：“他这个混蛋给我房子，我还要抓他的人呢！”他们吱唔了几句就走了。事后，我觉察到这话走了火，韩慎之一定要跑。

不一会，市党部的人来了，都说要先抓韩慎之，不出所料，韩慎之真的跑了。他到万县后给我来信说：“请易先生高抬一膀，我回来赔罪。”以后，听说他在万县死了。段少芳见韩慎之跑了，怕不好交待，也跑了。陈松文没有什么恶极，我们没动他。

马文轩也是宜昌的一霸，他们父子占据教育部门，贪赃枉法。我们当时组织人清理教育经费，发现马的问题很大。一天，我们派人把马文轩弄来，要他交待问题，晚上他要回家，市党部管教育的胡浚文说：“你回去不了啦。”马文轩就在那里哭闹，我给他讲道理他不听，我把桌子一拍，说：

“这是什么场合？你还撒野！”这下马家的人着急了。他的大儿子马绍文跑来给我跪下，小儿子也来作揖磕头，一些人上门求情，英驻宜领事和马家的亲戚也联名具保。为了缓和空气，我们对外说可以保释，内定准备杀，后来夏斗寅叛变了，没来得及处决马文轩。

(五)

我回到宜昌那天，在街上看到一种情景：从二马路沿江边的街道往上走，到处摆着锅灶碗盆和被具衣物，大人哭、小孩叫，惨不忍睹。我向理发匠陈二毛打听，他说：“他们是被打座船赶上岸来的。前些天，宜昌出了几起抢劫案，夏斗寅认为‘棒老二’（土匪）躲在座船上，他指使总工会派纠察队打船，清除匪患。”我问：“现在市党部是谁当家？”他说：“是佟文正他们当家。”

第二天，我去找佟文正问情况，佟说：“前段宜昌市面较乱，一到晚上‘棒老二’就出来活动，抢劫行人的钱物、杀人，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和参谋长叶蓬召集市党部及群团负责人联席会，认为座船上是土匪的藏身之所，决定打座船，清除匪患，出席会议的各方人士都签了字的。”佟文正还告诉我：“打座船之前，先派人到江边去看，认为哪条船是不可靠的，即用红蓝粉笔在船上画个圈，然后下河，见画了圈的船就打。”

我问明缘由后，立即往市党部邀请各方负责人商谈怎样解决此事。当时中共宜昌特支书记、国民党宜昌县党部筹备主任胡楚藩，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领导宜昌的党、政、工、团工作。宜昌市党部的负责人是中共党员黄大桢、佟文正，县总工会的负责人是中共党员朱松年。我向到会人

员再次问明缘由和经过后，提出：（1）座船是驳船工人和划力工人的家，纠察队参加捣毁工人的家是严重错误的；（2）打沉座船并非清除匪患的有效办法，江上沉了船，岸上有大量房屋，土匪同样可以存身，难道把房子烧了不成；（3）夏斗寅平时同市党部、工会不睦，这次打座船却偏要纠察队参加，显然含有阴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这些意见，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二天还在争论不决之际，总工会来人报告：“划业工人包围了总工会，声势很大，工会关闭了大门，武装纠察队在围墙上与外面的工人对峙着……”这时大家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不争论了。我当即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县党部筹备主任的身份令朱松年迅速赶回总工会，向工人群众宣布我的四条意见：（1）立即停止打座船；（2）负责赔偿打座船的一切损失；（3）座船已经打了无家可归的人，总工会负责安置；（4）请他们推选代表共议善后办法，这才平息下来了。最后约定次日到夏斗寅司令部，谈判解决问题。

夏斗寅的司令部设在铁路坝，第二天上午，我和工农青妇的干部来到夏斗寅司令部。一上楼就见到叶蓬，同去的向叶介绍了我的姓名、身份和来意。叶说：“你回来之前，宜昌被弄得晚上不敢走人，我们晚上戒严、打座船，都是为清除匪患、安定社会秩序。”我说：“你们这种作法我是有意见的！”叶说：“照你的意见怎么办？”我说：“打沉座船就不一定能清除匪患。”叶说：“不打不行啊，土匪就在船上，你不打，他们上岸抢了东西又回到船上，如果要我们到每条船上去捉，才难办呢！”我说：“你们这样作，苦了这么多的老百姓，市面闹成这样子行吗？我提议：从明天起不能再打座船，不能在街上搜查行人，赶在街上的船民要妥善安

排，至于土匪藏在哪里，就到哪里去捉，捉到土匪头子就枪毙，胁从的关起来。”叶说：“我同夏师长商量一下，明天决定吧。”我说：“行，明天再谈吧！”

第二天，我们谈到中午仍无结果。最后我提出：军队和工人纠察队这三天都不上街，由警察和市民、学生维护治安，叶说：“我同夏师长商量一下，这个条件可以接受。”但他又说：“不过夏师长对我讲过，军队不管这件事是可以的，但我们的责任是保卫宜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住了这么久，还没发生大问题，现在既然易先生回来了，今后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就请易先生负责。”我说，那要等我召集有关方面的人开会研究再说。我回去后，向工、农、青、妇、学生会的负责人把情况一讲，大家都感到问题棘手了。

三天过去了，我又去找叶蓬，他的态度是硬的。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提议双方打电报请示上级裁决，我当天给省委发了电报。第二天我方的电报回复了，大意是：大敌当前，加强团结救国。我在接电报后，以县党部筹备处和总工会的名义致函给夏部，共同维护社会秩序，而夏部一直未作回答。

(六)

五月七日早上，我去上班，看见警察跟平常一样，手里拿着棒子站在街上，但军队没有了。我一到县党部，传达室的人就对我说：“昨天晚上，夏师长三次派人请易主任到司令部去。”我当即打电话要工农青妇各来两人一道去十四师司令部。我们一行到司令部一看，楼下的东西都搬光了，纸屑遍地，然后上楼，只见几张桌椅。叶蓬一见就说：“哎呀，老兄，你的贵驾真难请呀。”我说：什么事这么急呀。叶

说：“杨森的军队原来和我们接洽好了不动的，不知为什么昨天早上他的军队顺流而下，到了秭归。我们司令部已决定：部队开往沙市，缩短防线，集中力量对敌。现在宜昌的防线交给你，要维持商店不关门，我部守宜昌的责任到这个时候完了。”我一听就火了，气愤地说：好！宜昌天大的责任我承担！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

夏斗寅率部东下的当天下午，四川军阀杨森部的范绍增师，分水陆两路包围了宜昌。傍晚，陆路部队进入宜昌对河的山头上，水路进入宜昌南津关一带，东南一线不出十华里，是土匪的势力范围，情况十分紧急。我说：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投降，提头去见，我不干！二是打出去，决定把武装集合起来，从水路向武汉撤去。此时，夏斗寅把停在宜昌的轮船已开走，走水路也是难题。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我们集中武装纠察队的二十多条驳壳枪，农民自卫军的六十多支步枪，决心从陆路冲出敌人的包围。正在此时，在江边防守的纠察队员来报告：“一艘挂美国国旗的美丰轮靠岸了。”我带领已集中起来的人登上美丰轮，强令迅速开航，船员说煤烧完了，不加煤无法开，我就叫驳船公司把装煤的驳船用铁钩子挂在轮船上，边上煤边开船，武装人员开枪向敌人还击。

船到沙市河心，岸边一艘小火轮向我们驶来，船头站着一人，手里拿着旗帜边摇边喊：“不要打呀，不要打。”我看是夏斗寅部的宣传科长，便令停止航行。那个宣传科长来到我们船上，便说：“昨天晚上，夏师长要我找你，没找着，夏师长说，他的人不多，要集中力量对敌，包括政治部的人都随船走了，现在你们也走了，宜昌怎么办？”他劝我把人带转去，协助他们把宜昌夺回来。我说：“你既然来

了，就送我们一程。”他站在船头摇旗，要岸上不要开枪，并把那艘小火轮拴在我们的船边。这时，我令船员开足马力，直向下游驶去，过了沙市，才把宣传科长和小火轮放走。夏的部队立即向我们船开枪，而美丰轮却全速前进，直向武汉驶去。

(七)

我们的船到汉口已是夜晚，岸上实行戒严，外来的船不准靠岸。次日八点钟，我们船上的人才上岸。

我到省党部报告了情况，问怎么安排？省党部的同志说：“你们纠察队、工会、农协的干部和学生，分别由省总工会、省农协和省学联接收下来，听从安排。”

我们的船抢先去武汉后，夏斗寅觉得天机败露，于是他撕掉假面具，公然向全国发出了“反共产，救中国”的通电，声称向武汉进军。五月十七日，叶挺令许继慎率七十二团挺进纸坊附近，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前进。十九日凌晨叶挺率七十五团和中央独立一师赶到纸坊，经过三小时激战，将敌人击退。二十日，夏部被击溃，残部向通城逃窜。在反击夏斗寅的战斗中，我带的武装人员参加了战斗。

夏斗寅叛变平息后，董必武召开会议，指定我兼麻城县临时县委书记，去那里整顿与恢复党的组织。六月，省委电召我回汉，此时，鲁涤平已率部收复宜昌，令我们回宜昌工作。七月六日，省党部执委召开会议，通过整顿各县、市党务计划，成立鄂西临时党务指导委员会，曹壮父任主任，段德昌、张一凡和我为委员，指导宜昌、兴山、长阳、秭归和恩施地区各县的党务整顿恢复工作，指导委员会设宜昌。

在离汉前，我们给宜昌发了电报。船一到宜昌，工农青妇的人都在码头接我们。第二天，曹壮父主持召开会议，部署了工作，会后，我即赴西乡，一面着手恢复农协组织，一面组织农民自卫军。接着，鲁涤平也叛变了，我们便转入地下活动。不久，我被派往宜都白洋团防搞武装，此后，我就离开了宜昌。

注：易朴，原名易光吉、易辅臣，宜昌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宜昌特支书记，后来曾任过上海中共中央局发行科长、天津市委书记、北方发行部长、重庆《新华日报》社党总支书记、东北局绥东工作团团长、松江省委委员、秘书长，武汉市委秘书长、副市长，中央交通部公路设计院副院长。一九八三年七月十日病逝，终年八十一岁。